

漫談治學方法

周道濟

讀書達到某種程度，基礎已立，領悟力已強，此時如果一卷在手，隨意瀏覽，馳騁於中外之事，神交於古今之人，的確是一件樂事。但如果進而治學，情形便不同了：找資料，別異同，證事理，定學說，沉思冥想，反覆推敲，其間之艱難困苦，真是一言難盡。偶有心得，忽然貫通，固然感到非常快樂，可是這種快樂，並非到此為止的滿足，因為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從事學問的人，永遠不會感到知識上的滿足。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這個「殆」字，正可以把它看作學者之於學問，孜孜兀兀，終身辛勤的寫照。說實在話：研究學問當然有其快樂，但畢竟苦的時候為多。妙的是：未經其苦，便不能領會其樂，而很多學者，一方面日以繼夜，無視其苦，他方面又年年月月，以獲得此中之樂為真樂，甚至悠然自得，樂此不疲。所以談到治學，總是要有幾分優勤的。

有了治學的優勤，如何治學呢？就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而論，淺見認為可以分作下列三個層次加以說明：第一層次着重基本的修養，其中包括：

(一) 要有客觀的態度：由於歷史傳統和社會環境等影響世人對於各種事物的看法，往往有其成見或偏見，這些成見或偏見，都是瞭解事理真相的障礙。我們研究學問，雖不能遺世獨立，但在態度上，却要把握客觀的立場，避免主觀的愛憎，盡量拋除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偏見，這樣，方能觸及實際，解決問題；否則，霧裡看花，愈看愈模糊，必至心勞力絀，一無所見。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處理問題，不宜先有武斷式的結論。倘若自始即定好結論，然後再為此結論，解釋辯護，多方粉飾，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樣，無異削足適履，顛倒是非，不但浪費精力，無補於實際，而且還會導入歧途，愈陷愈深，終至不能自拔，誤己誤人。舉一個例：有些人總認為孔子專講人治，不重法治，專講道德，不用刑罰。他們並且由此推斷，只有法家才重法治，而刑罰則為法家的專有工具。這種看法是很有商榷餘地的。其實，孔子的意思只是：用德和禮來教導人民，比用政和刑來治理人民，更為高明，德禮所以治本，政刑所以治標，他並非主張根本不用政刑。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

）那麼，教而後殺，便不能算是虐了。孔子又說：「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家語刑政）可見孔子絕未輕視政刑。

(二) 要有懷疑的精神：懷疑是推動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惟有具備「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懷疑精神，抽絲剝繭，窮源究委，事理乃能愈演愈明，真相乃能水落石出，而學術也才能日新月異。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裡所說的「思」，懷疑實為其出發點，沒有懷疑，遇事「想當然耳」，恐怕便無得思維了，我們的學問，恐怕也就要停滯不前了。舉一個例：一般人在講到宋朝初年的宰相趙普的時候，每喜歡提一提他「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故事。這則佳話，傳之多年，有些人不免懷疑：趙普據以治天下的半部論語呢？究竟是論語的上半部還是其下半部呢？後來有人解釋：這所謂半部，乃是籠統而言，它既非「上論」，也非「下論」，而是指論語中適合於當時為政致治的那些章句，如

拼合起來，約略等於全部論語的一半而已。這種解釋，原已差強人意。不過，我拜讀洪業先生的大文「半部論語治天下辯」，才知道事情並不如此簡單。洪先生在文中，旁徵博引，反覆考證，結果斷定：這則佳話，與美國總統華盛頓小時候曾向他父親承認用斧頭斫斷了爸爸心愛的櫻桃樹一樣，同出於後人的虛構。由是可知治學之難，亦可知懷疑精神的重要。

(二) 要精，也要博：從事學問，不但要有所專精，也要廣博；沒有廣博的基礎，衆端參觀，涵濡浸潤，反易成爲「飽學的無知者」，這種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天天鑽牛角尖，最多仍是不通的專家而已。語云：「爲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真是治學的寶訓。尤其在現代，專門學科愈分愈細，愈演愈多，爲免支離破碎，各趨極端，寓專精於博大之中，更有其必要。今日學界倡行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運動，實亦針對此點而發。以故，我們研究某一專門問題時，對於與其有關的若干學科和知識，必須具備適度的通盤的瞭解。例如：一九七二年以來的美國水門 (Watergate) 事件，我們倘若要徹底加以研究，對於美國的憲法、歷史、政黨情形、政治制度、新聞自由，以及社會心理等，便不能不有相當的瞭解。

第二層次我們於發表意見或有所論著時，應該注意的一般事項，它包括：

(一) 要善於蒐集各種資料：資料愈

多，論證的把握愈大，所以資料的蒐集要力求完備。所謂資料，並非僅限於書本，凡一切可以運用的文物，都可以作爲參考的資料。即以書本而言，有用的資料亦不僅限於直接的明示的陳述，凡能由反射作用、間接印證或暗示相關情境者，均爲良好的資料。有人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來形容廣泛搜求資料的功夫，殆非誇大之辭。例如：我們研究殷周時期的政治思想，除一般經史子集的書籍外，從若干新出土的地下物件中，尚可找到不少有用的資料。此外，從當時的典章制度及社會生活中，也可看出其時的某些政治思想，故我們均宜注意及之。同理，我們研究古代的政治制度，所用的資料，亦不能以「三通」、「六典」、及「職官志」之類爲已足，他如史傳文集、碑誌雜記，甚至大藏經等，均應參考及之。

(二) 要有合理而正確的根據：學術上的論點，要有合理而正確的根據，方能紮實；遊談無根，信口開河，終不是學者的行徑。故資料雖已完備，實際引用時，還要多多留心。必要時，寧可失之嚴，不可失之寬，俾免以訛傳訛，爲禍無窮。最應注意的是：決不能斷章取義，以偏概全。須知資料中所顯示的事物，有的是概括性的，有的是個別性的。概括性的證據，引用起來，固然簡單明瞭（例如：後漢書陳忠傳云：「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由這一段話，不難看出：西漢的丞相有所奏請，皇帝大多接納照准）。個別性的證據，非集合很多類似的事例，則不能輕易進而論斷（例如：前漢書田蚡傳

云：「蚡以肺附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倘只根據此一特例，即遽而推斷西漢相權之大，便很危險）。何況，資料與資料之間，由於來源、時間、版本等等的不同，證據力的強弱亦有很大的差異，故選取資料時，必須用慧眼，憑良知，妥予識別，加以鑒定，庶不致反爲資料所誤。

(三) 要致力於概念和體系的創建：個別事物的考訂和資料義蘊的整理，是治學應有的手段，但並非治學的大目標。治學的大目標，恐怕仍在於新概念的創造與新體系的建立。故一味墨守成規、人云亦云，或只知在校校節節中打圈圈，而玩物喪志者，終不能成其大學問。自古以來，大學問家多爲思考周密、功夫精深、推陳出新、能破能立的人，他們個人的著作不一定都很多，所陳所述也不一定字字珠璣，語語動人，但他們的論著却有一共通的特點，即成串的概念與完整的體系是也。就在這些概念和體系中，真善美的精神由之而發揚，許多顛撲不破的道理由之而爲世人所認識，此其所以難能而可貴。

(四) 要注意理論與實際的溝通：有些學問，本身就偏於實用性，有些學問則偏於理論性。從事於實用性的學問，我們固然要精益求精，以宏其用；從事於理論性的學問，我們也應該儘量使理論與實際互相溝通，以擴大理論的效果。這一點，我認為對此時此地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尤其重要。學術是服務人羣的，不是象牙之塔裡的裝飾品，它的終極目的，乃在於改善人羣的生活，加速社會的進步。孤芳自賞或與世隔絕，

殆非學者應有之義。試問：如果沒有人類、國家和社會，何來學術？又何用學術？古人說：「學以致用」，是很正確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以悲天憫人之心懷，創建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切望從精神上、物質上以及各方面改善國人的生活，加強社會的建設，以進而救中國、救世界，正是我們的好榜樣。

第三層次屬於方法論 (methodology)

(一) 上所講的各種窮理致知的方法。

茲為便於說明起見，姑以政治學為中心，略將各種主要的研究方法，介紹如後：

(1) 演繹法 (deduction)：亦稱哲學的推理方法，係由既知的原理或假定，以引出特殊結論之謂。它是一種很古老的方法，惟時至今日，依然有其正當的用途。這種方法的缺點，在於其所根據的前提倘有錯誤，它所推演出來的結論也就不會正確了。

(11) 歸納法 (induction)：根據各個特殊事實，以為推知普遍真理的方法。歸納時，所列舉的各個特殊事實，以愈多愈好；最低限度，以愈有代表性愈好。否則，很容易遭致以偏概全之弊。

(111) 觀察法 (Observation)：乃直接觀察各種現象加以研究分析的方法。運用此法時，有二點必須特別注意：一、觀察的範圍要廣大，不可僅限於一隅，以免由偶然的現象，造成必然的推斷。二、眼光要銳利，庶能觀察入微，以探出在現象表面下的真相和隱藏於名詞後面的

真義。

(四) 實驗法 (experimentation)：政治學者雖不能如自然科學家之有其實驗室以進行實驗，但在某種程度之內，亦可以有其實驗。泛言之，整個社會無異為一龐大的實驗室。從而，國家頒布一條法律、施行一種政策，或組織一個機關，就是付之實驗。如行之有效，便繼續下去，如行之無效，則圖改革，此正由試驗中以吸取教訓之意。我國過去在大陸上的實驗縣，以及在臺灣的免試升學試驗，都是明顯的例子。

(五) 比較的方法 (Comparison)：此一方法在政治學上的運用很廣。把一個國家古今的制度加以比較，可以知道這個國家的進步情形；把採取相同制度的許多國家來作比較，可以看出一個制度在不同環境中不同的適應。比較方法由於能將相同的結果歸溯於相同的原因之上，以求得一般性的結論，故甚客觀；但它有一定的限度。學者如把不能互相比較的對象硬作比較，反易加強主觀上的錯誤；倘若過於依賴比較方法，對特殊情形與環境常會忽視，亦必影響結果之正確。

(六) 歷史的方法 (historical method)：歷史方法在政治學中很早即被採用。我國宋代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就是一部偉大的歷史政治學；在希臘的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所著的政治學 (The Politics)，頗多取材於許多國家的歷史，也是很重視歷史方法的。的確，古來治亂興亡之跡，豈止供人憑弔而已，從這些史實中，我們往往可以歸納出若干重要的

政治原則，引為殷鑑。而且，歷史是演進的，明瞭昔日的「來龍」，自有助於把握明日的「去脈」。凡此，都是歷史方法的長處。當然，歷史方法也有它的短處：一、政治固有其連續性，今日的種種，皆從昨日種種演進而來，但我們却不能否認每一時代的人均有其創造性，以昨日種種解釋今日種種是可以的，倘以昨日種種來限制今日種種的發展，便是抱殘守缺，食古不化了。二、史家筆下的歷史，並非完全是客觀的，若干記載與真實情況每有距離，所以引用歷史的資料，不能不多多小心。

(七) 統計的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此法對數量性的材料，作有系統的整理、計算、分析，及解釋，現已成為研究政治的一種重要的工具。它的優點在於客觀而實際。不過，統計方法的運用也是有限度的：一、很多政治問題，如國家理論、民族道德、自由平等之類，不能量化，亦即不能用統計方法處理。二、如果材料不夠，抽樣沒有代表性，或統計者未考慮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響，則統計分析的結果，亦不會真確可靠。

(八) 心理的方法 (psychological method)：近代心理學大有進步，很多學者乃採用心理的方法，從人的性格和行為動機中，以研究各種現象及問題。這不但為政治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且亦為政治學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其成績較著者如：華萊士 (Graham Wallace)、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梅瑞恩 (Charles E. Merriam)、及抱斯威爾 (Har-

old D. Lasswell) 等，均曾糾正了許多傳統的觀念。心理的方法使研究政治者得以透入政治問題的核心，這是它的最大長處。但心理是不易把握的內在作用，直到今天，心理學者對於許多的根本問題，還沒有正確的結論。故我們在利用心理學知識的時候，必須抱持審慎的態度。

(九) 行為研究法 (psychological approach)：又稱「行為途徑」，乃晚近政治學者利用行為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研究政治現象的方式。它建立在一個基本假定之上，即吾人要了解政治現象，必須從人們在實際政治中的行為着手，而這些政治行為，是可以科學方法去觀察、分析、試驗，而獲得可靠的結論的。故政治的行為研究，實際上就是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在政治上的一種表現。行為研究法最強調的是理論與經驗研究的互倚關係 (mutual interdependence)。

ndance)，由此遂發展了經驗取向的理論 (empirical oriented theory) 和精巧的研究設計 (sophisticated research designs)。由於它要借重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新方法，如對局論 (game theory)、概率論 (probability theory)、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抽樣調查 (Sample survey)、面談技術 (interviewing technique)、問卷法 (questionnaire)、投射測驗 (projective test)、以及控制實驗法 (Controlled experiment) 等，而行為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s) 則包括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社會學、及經濟學等，故行為研究法也可以說是一種科學整合運動。行為研究法是很進步的研究方法，它的優點甚多。然而，過於注重計量、指標、資料的蒐集及分析等細節，容易造成枝枝節節的知識；強調科學的探討，不

理會價值的觀念，以致對許多的重要問題，只有避而不談，則是它的主要缺點。針對這些缺點，近幾年來，又有「後行為主義」 (Postbehavioralism) 的興起。可是，後行為學派所強調的一切既然避免不了價值問題，而這個價值問題如何解決，始不致陷於武斷與臆測，到目前為止却無着落，將來是否有其着落，亦很難說。(參看 Prof. M. C. Ekstein: the Limitation of the Behaviou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Fort Ha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由上所述，可知這些研究方法各有特色，但多多少少，亦均有其限度或缺點。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治學，當視研究的對象和情形，混合使用各種適當的方法，取其長，去其短，發揮協同一致的全面「火力」，庶能消滅學術上的死角，獲致良好的成果。

中外文庫

文庫

論叢

全一冊

謝康 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畢」、「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

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